

澳大利亚核潜艇方案呼之欲出

■张锦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3月中旬，英国首相苏纳克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将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一起宣布美英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的具体方案。此外，美国考虑在该型核潜艇服役前，向澳大利亚派驻B-21轰炸机，以填补所谓战力空白。

美国造船厂不堪重负

2021年9月15日，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成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AUKUS)。澳大利亚随即取消与法国签订的潜艇大单，转而寻求在美英帮助下建造8艘攻击型核潜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方案一直没有公布。

据美国媒体最新消息，美国印太司令部前司令、退役海军上将哈里森日前向美国国会表示，为澳大利亚开发核潜艇的计划可能将在不到30年内完成，前提是英国担负起责任。这一时间点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吉尔戴预测的基本一致。他认为，如果美国向澳大利亚提供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最早到2040年左右才能投入使用，最后一艘预计将于2060年前服役。值得注意的是，该型核潜艇的核推进装置不适用于亚洲大陆沿海浅水区，还需要对其转向和控制系统进行优化，并加装新型电传操控系统。

也有观点认为，上述计划存在不确定性，主要因为美国无法为澳大利亚订单额外增加产能。美国战略型核潜艇项目执行官帕诺透露，协助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将给美国本已超负荷运转的造船厂带来沉重负担。目前，美国核潜艇制造厂正倾力打造本国的哥伦比亚级战略型核潜艇。作为美国迄今建造的最大潜艇，哥伦比亚级战略型核潜艇将替代现役的俄亥俄级战略型核潜艇，服役至2080年。首艇“哥伦比亚特区”号原计划于2027年4月交付，但自2022年开工以来，由于设计、材料等方面的困难，已经面临延迟交付。为此，美国国会两名颇具影响力的参议员致



美国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右)与澳大利亚柯林斯级核潜艇一起参加演习。

信白宫，警告“帮助澳方获得核潜艇”将使美国造船厂难以负担，甚至有损美国自身安全。

英国设计方案受关注

就在美国不知如何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时，有消息称澳大利亚可能选择英国的设计方案。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森近日表示，澳大利亚打算让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实现“真正的三方合作”。他为新潜艇将大量使用外国技术和部件辩解称，澳大利亚几乎所有主要武器系统都依赖于外国技术，核潜艇也不例外。

据介绍，澳大利亚的目标可能是英国下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即SSNR。英国国防部已于2021年9月分别向BAE系统公司和罗尔斯·罗伊斯公司授予价值8500万英镑(约合1.02亿美元)的合同，用于SSNR的设计和研发工作。该型核潜艇计划于2040年左右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以取代现役的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截至目前，英国尚未与其他国家签订有关SSNR的合同。不过，这个方案也有问题。澳大利亚

海军主要与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进行合作，其核潜艇由美国设计建造更有利于两国间的交流。同时，澳大利亚希望在核潜艇上安装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未来还可能装备高超音速导弹，英国下一代攻击型核潜艇不具备这样的发射能力。

分析人士指出，英国方面更希望由三国合作研发核潜艇，具体以英国为主导进行总体设计，加装美国的武器模块，打造一款由三国生产线分别制造组件并实现规模效益的新型潜艇。除获得经济效益外，英国还可借此分摊研发成本。

欲借B-21填补战力空白

考虑到澳大利亚核潜艇的交付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美国计划在其形成战斗力之前，向澳大利亚派驻B-21轰炸机。报道称，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包括一项决议，要求国防部长就实施“奥库斯”计划面临的挑战进行评估，并研究其他帮助美国盟友的方案。美军报告称，除租借或帮助建造潜艇外，向澳大利亚派驻B-21也是一个选项。

澳大利亚国防专家近期呼吁澳政府从美国购买B-21，以获得对亚洲大陆的

远程打击能力。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对2033年前提升澳大利亚国防军攻击能力的方式进行研究。报告认为，澳大利亚目前装备的F-35A战斗机，在没有空中加油的情况下无法到达亚洲大陆附近，其有效作战半径仅为1000公里左右，在空中加油机的支援下，可以扩大到1500公里左右，这意味着即使装备JASSM-ER导弹，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打击范围也不足以覆盖亚洲大陆。而且，空中加油机在面临威胁的空域能否有效使用令人怀疑。

相比之下，B-21可以帮助澳大利亚改变军事格局，因为它具有超远航程，无须加油便可深入亚太地区。1架B-21可以携带至少相当于6架F-35A携带的弹药。超远航程、先进的隐形技术和大量弹药使B-21能够单独作战，与一般的打击编队相比优势较大。

分析人士认为，未来美国在澳大利亚部署B-21的可能性较高，但澳大利亚短期内购买B-21的可能性不大。即使美国愿意出口，也得在满足自身需求后再作考虑。预计B-21还需要7年左右才能形成初始作战能力，届时美军将优先装备，澳大利亚很可能要排队等候。

环球时评

近年来，德国作为西方大国和欧盟核心国，其对外战略受到广泛关注。德国的战略选择，将影响欧洲和全球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德国试图通过制定新安全战略来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并希望在2月17日至19日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该战略进行说明。然而，由于国内种种问题，德国的新安全战略迟迟未能落地。

德国制定新安全战略的大背景是总理朔尔茨所言的“时代转折”，即乌克兰危机后德国对全球和欧洲层面政治和安全环境的认识发生根本性转变，认为德国以前享受的和平红利和发展机遇已不复存在，需要应对战争威胁和大国对抗等挑战。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德国和整个西方对于所谓“保卫自由”“支持民主”“应对异质性挑战”等方面的政治氛围逐渐固化，对外战略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价值取向更加强烈，进一步加剧德国安全战略在对抗性、竞争性上的调整。制定新安全战略是德国政界和民间的共识，意在通过硬实力建设和兵力投射，改变德国历史上以“和平主义”和“民事力量”塑造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的历史。

在安全战略趋于强硬的背景下，德国国内多种冲突因素阻碍了其形成共识。其中，德国国内政治的“群雄混战”和权力之争，是影响安全战略落地的最主要因素。2021年联邦议会大选标志着德国长达16年的“默克尔时代”结束，政治格局从超稳定状态转为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勉强组阁的“三强分立”体制。绿党重新回到权力中心，掌握了外交部、经济部等政府关键部门。绿党出身的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上任以来，一直将绿党的价值观融入安全政策，在西方政治风潮下抛弃和平外交，迫使德国突破军事、历史底线。事实上，绿党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上的跟风，更多是为赢得支持率，超越社民党，进一步在德国政坛布局落子。

从政府和社民党角度看，希望通过制定新安全战略重新掌握塑造外交政策的主动权。德国总理府成立了专为总理负责的团队来撰写报告，不断反驳绿党和外交部的偏激政策。然而，在西方世界向德国施压的大背景下，朔尔茨不得不向绿党的政策倾向作出妥协。德国国防部长的更替、德国在提供军援问题上的历史性跨越，都说明其围绕安全战略主导权的博弈日益复杂。

在财政问题上，德国三大执政党也未能达成共识。尽管三方都认为德国应增加国防开支，达到GDP占比2%

安全战略争议凸显 德国战略调整力有不逮

■董一凡

的北约标准，德国还设立了1000亿欧元(约合1073亿美元)的特别国防基金来升级军备，但绿党仍希望增加国防经费以及提高发展援助、人道援助、外交和文化经费等“软实力”开支，这与德国传统的财政审慎态度不符，也招致长期坚持严格财政平衡、主导财政部的自民党的反对。同时，随着德国经济面临内外危机和债务暴增的风险，其在防务、外交、对外援助领域的扩张，难以获得足够的经费支持。

总的来说，德国制定新安全战略面临很多障碍，这表明德国在安全观念剧变下的政策调整，受到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显著影响。同时，这也意味着冷战后德国审慎、稳健的战略文化在不同价值观和外部环境作用下，理性与务实色彩或将日趋淡化。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美国防工业跌入“错误方向”

■刘懿铭

近日，美国国防工业协会发布了第4版年度评估报告。新版报告没有采用此前版本“考察8个基本维度、设置60余项指数打分”的评级方式，而是侧重于分析评估美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国防工业的备战情况和问题。

报告援引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观点认为，为在大国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五角大楼应把工作重点放在进一步提高美军的威慑能力、与盟友保持密切合作、加强脆弱的供应链、打造弹性十足的国防工业基础等方面。美国国防工业的目标是确保美军士兵拥有所需的平台、技术和保障，建立并维持对竞争对手的压倒性优势。

然而，美国国防工业呈现出日益萎缩、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严重不匹配。报告将这种不健康状况归咎于“冷战结束的影响”，认为竞争对手消失、军事威慑减弱等因素扰乱了决策者的判断，使得国防工业的重要性逐年下降，最终导致其发展缺乏弹性。

报告指出，美国国防工业的活力和动力来自于稳定的预算、经验丰富的劳动力、多样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创新的理念及充足的制造能力。然而，这些关键要素在过去数十年受到冷战后思维的影响，已跌入“错误方向”。

首先，近40年来，美国国防工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减少了约2/3，1985年时有超过300万名经验丰富且技术熟练的工人，到2021年已降至不到110万人。

其次，大量军工企业倒闭或改行带来了恶劣影响。过去5年，超过1.7万家企业离开了军工行业，其中小型军工企业倒闭或改行的比例超过40%。企业数量的减少导致军工行业的竞争力、多元化和规模下降。调查显示，美国国防工业协会42%的会员企业称自己是美国唯一符合条件的军工产品供应商，“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趋势，表明美国国防工业

的活力正在丧失”。

第三，军工行业所得经费的GDP占比持续下降。自1985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的国防开支GDP占比呈现缓慢且持续下降的趋势，这一数字已从5.8%降至3.2%，预计到2036年将降至2.7%。

第四，预期发展不乐观。报告通过分析过去10年的数据，发现美国联邦政府在大部分时间内未对军工行业进行有效的激励。在不远的将来，政府将继续推行降低购买力、延迟重要项目启动等政策，国防工业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第五，激增能力受限。激增能力是指在短时间内对生产能力进行扩大。报告认为，目前美国国防工业的基础设施已无法支撑高强度的产能激增，对基础设施和装备的投资不足、产能闲置、对单一制造企业的过度依赖等因素，将严重影响国防工业水平的提高和产能的扩大。

美国国防工业协会在报告中建议，应当采取措施解除国防工业面临的困境，大幅增加对军工行业的“可预期投入”。



美国空军维护人员搬运TF33发动机。



德荷整合军力加快“欧洲军”组建

■方晓志

据外媒报道，从4月1日起，荷兰陆军第13机械化旅将并入德国第10装甲师，未来两国的陆战力量将融合为一个整体。这是德荷两国整合军事力量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欧洲防务自主的又一尝试。

2022年3月21日，欧盟理事会将组建快速反应部队写入“战略指南针”行动计划。该部队规模约5000人，包括陆军、海军、空军和网络部队，旨在应对地区危机。相比欧洲各国抽调人员成立快速反应部队，荷兰旅级部队并入德国国防军，被认为是推动“欧洲军”组建的重要步骤。

实际上，德国和荷兰的军事力量整合由来已久。早在1995年，两国就成立一支联合部队，驻扎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市。2014年，荷兰第11空中机动旅并入德国快速反应空降师。2016年，荷兰第43机械化旅并入德国第1装甲师。同时，德荷两国还共享荷兰海军最先进的“卡雷尔·多尔曼”号护卫舰，并研究德国国防空部队

加入荷兰国防军的事宜。德国和荷兰合并军队是出于两国利益的需要。德国总理朔尔茨上台后加快了军队建设步伐，修改了基本法，设立1000亿欧元(约合1073亿美元)的特别国防基金，主要用于购置战机、坦克和弹药。德国还积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防务合作，试图建立以德国为核心的防务体系。德荷两国计划组建一支5万人的步兵联合部队。荷兰作为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为了弥补战略纵深不足和部队规模较小的弱点，希望通过与盟友合作以实现集体安全。德荷两国军队装备相同或兼容的武器系统，同时还在积极推进军事装备联合购买和制度标准化。

从影响上看，德国和荷兰整合军事力量，将给欧洲力量格局带来较大冲击，特别是会加剧北约内部的矛盾。北约成员国间的关系本就复杂，在许多安全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和共同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评价北约已经“失去活力”。因此，北约对欧洲正在实

施的防务一体化进程保持高度警惕。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多次警告，要求欧洲的独立自主防务能力建设应是对北约能力的补充，而不是与北约竞争或者建立一个北约的替代品。

德国和荷兰整合军事力量的做法，可能引发北约其他成员国的效仿。如果这一趋势向其他国家扩大，将改变欧洲的防务态势，从而削弱北约在欧洲安全事务上的话语权。

此外，德荷两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会引起欧洲其他国家的担忧。由于历史原因，欧洲一些国家很难接受形成以德国为中心的欧盟军队。特别是法国一直与德国存在竞争关系，希望在欧洲防务一体化中发挥主导作用，对德荷两国合并持保留态度。这些因素都将给德国主导构建“欧洲军”的计划带来制约。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上图：荷兰第11空中机动旅的士兵在马里执行任务。